

享有盛誉的法兰西思想家、文学家卢梭,不论生前还是身后,都深受法国和世界学界的关注与推崇。政治学者尊奉他为革命导师,文学作者视其为浪漫主义之父,伦理学者推崇他的人格意识,思想史界将其视为人类自由的维护者。2012年是卢梭诞辰300周年——法国“卢梭年”,在法国本土及欧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纪念活动。是年6月,由南京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和狄德罗大学联袂主办的“卢梭诞辰30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大举行。我们假此次国际研讨会,和前来与会的索邦大学卢梭研究中心主任、《卢梭研究》主编唐吉·拉米诺教授,就“卢梭与当今西方与东方”这一话题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对话,内容涉及卢梭在法国和欧洲研究的历史与走向、卢梭的理论价值与思想意义的重估、卢梭在当今世界的形象重塑与文化运用,以及卢梭与中国和亚洲作家的精神关联等诸多方面。唐吉先生不愧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对所涉话题,如数家珍,不仅生动有趣,且深切肯綮,对当代卢梭学界颇多启发。

在思想史家的眼里,卢梭是启蒙运动的干将,浪漫主义的先驱。那么卢梭的思想在何种程度上与当时的启蒙吻合,他思想中的哪些层面成为浪漫主义汲取的精华?德国格拉夫斯瓦尔德大学莱因哈德·巴赫教授通过

大量思想史资料的梳理,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卢梭思想的核心乃“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自然即自然人的成长,与文化人相悖,人类文明的进步不能促成个人的完善,相反却意味着人性的堕落。社会秩序同人的本性相悖,为此要废除社会的不平等,废除等级制度,这就是卢梭宣扬的“变革”。在这一层面上,卢梭与其他启蒙思想家分野,而以变革著称的浪漫主义恰恰是在卢梭批判的层面“接纳”了卢梭。

而今,卢梭去世已两个多世纪,他那些曾经深入影响并改造了18、19世纪欧洲社会的理论著作,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分析还有参考意义。在卢梭看来,战争状态指的是国家和民族之间因紧张持续的敌意而形成的一种日常关系。即使没有进攻行为,这种敌对的关系也没变化。瑞士加布里埃尔·加利斯博士分析认为,“二战”后世界开始的冷战格局乃至世界—国家等级中的经济关系都带有权力、武力和暴力的印迹,而其展示的就是卢梭所谓的战争状态。唯有强化政府和普通民众间的关系,这种战争状态才能消除,但此仅乃理想而已。

卢梭的作品涉猎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而其语意指涉的丰富性也为后世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诸多空间,巴黎米凯尔·德·圣·舍隆教授选择羞耻观这一独特的视角,比较了卢梭、卡夫卡和列维纳斯。卢梭认为羞耻源于自身的体验,带有鲜明的主观性;卡夫卡则将耻辱归于个人感知的同时,也将感受的参照扩充到自我之外的他者;列维纳斯从伦理的视阈肯定了人只有在他者那里才更明晰地感受到羞耻感,进而把耻辱界定的哲学视阈界定为他者。卢梭之所以成为18世纪享誉世界的思想家,不仅因其遗世独立的人格追求,还有他纷繁复杂的立论,即使同为启蒙时代的伏尔泰也难望其项背。吴岳添教授从政治思想、宗教信仰、文学价值和道德人格四个层面比较了卢梭与伏尔泰,认为后者的影响已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消失,前者的著作则面向未来的新时代,至今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思想史仅是解读卢梭的维度之一,详尽的文本细读依然可推动卢梭研究出现新的进展。刘小枫教授认为卢梭在《论科学与文艺》的序言中预设该文的读者为某些贤哲之士,而非公共知识人。这里的贤哲指古典的智识

者,公共知识人则指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是卢梭的朋友狄德罗。卢梭希望启蒙能够关涉人类幸福的真理,反对那些受时代、国家和社会支配的狂热的启蒙运动。也是在这一层面上,卢梭体现出鲜明的反启蒙立场。这一分析为学界更好地理解卢梭思想的双重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山中书简》一书出版于日内瓦政局动荡的非常时期,当时卢梭与日内瓦决裂,被迫流亡。信中那个语焉不详的收信者“先生”,多数学者认为是假想对象。吴雅凌研究员综合文本产生的语境,结合其他文本的阐述,对此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得出这一对象应为卢梭的论敌伏尔泰,为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当然,个案的分析不能游离于其他文本之外,尽管卢梭的思想纷繁复杂,但批评者似乎都可找到贯穿其创作始终的逻辑链条。这也是历来卢梭批评及阐释学者墨守的一个成规。日本学者桑畑章二郎教授将一体性作为研究的对象,认为一体性不仅是卢梭哲学体系的特征之一,也是其文学创作意图连贯性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哲学的体系化,还是创作主题的趋同,抑或创作意图,乃至署名,都体现出卢梭希望塑造一体性的自我努力。这种一体性就像一道栅栏横亘在读者面前,对阐释者实施着决定性的影响。唯有详尽考察卢梭一体性概念背后的复杂意蕴,研究者才有可能突围,获得新的进展。

卢梭研究的另一路径是传播和接受史的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卢梭思想之深、兴趣之广,同代人难以匹敌。而他卓尔不群的人格特点使得研究者无法用既定的框架去评析。就法国本土而言,20世纪50年代学界塑造的卢梭是一个进步、宽容、反对极权制的形象。之后出现的冷战局势使卢梭形象滑向两极,一个是“自由世界”的卢梭,一个是苏维埃政权中的卢梭。60年代末“五月风暴”的出现,卢梭再次被视为青年的精神导师。80年代后,卢梭才以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协调和为“共同生活”的公民服务的双重身份出现,这种形象的判定一直延续至今。90年代后,学界开始注意卢梭在音乐和科学界的贡献。唐吉·拉米诺先生结合大量的史料,对20世纪以来法国卢梭研究的走向做了详尽的分析和爬梳。不可否认的是,除却极个别的特例之外,任何批评都会受到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法国如

此,北美亦然。加拿大菲利普·基内教授的《卢梭与北美》一文,以汉娜·阿伦特、查尔斯·泰勒、阿兰·布鲁姆三人为个案,分析他们对卢梭研究的贡献。阿伦特关注卢梭作品中关于政治行为的怜悯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泰勒则从卢梭对良知和情感的呼唤中剥离出了被欲念遮蔽的本真性,并将其界定为公民借以摆脱灵魂堕落的主要途径;作为《爱弥儿》的主要译者,布鲁姆则侧重通过卢梭,对北美高等教育简单进步主义的现状开一剂药方,希望能将建立在自然秩序上的道德伦理纳入课堂教学。著者虽未对他们的批评划分优劣高下,但他们的研究丰富了当代学界对卢梭的解读。而其对卢梭思想内部种种紧张关系的思索为人类现代意识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参照。

卢梭影响的又一重镇是亚洲的中国。其《社会契约论》作为首部作品流入华土之时,正值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萌发,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巨变之际,它所彰显的“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革命民主思想,在我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初期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反响,并引发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异常深刻的论争。王晓苓教授通过复严《民约平议》、章士钊《读严几道〈民约平议〉》、张奚若《社约论考》的解读、比较和深入考论,对思想家卢梭东方之旅的中国影响,作了清晰的梳理和透彻的阐述。作为最早被译介的法国作家之一,卢梭文字的个人气质和对自我的推崇暗合了晚清民国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袁筱一教授的《卢梭、自我与中国的启蒙》通过对清末民初中国启蒙时代知识分子心态的分析,揭示了他们接纳卢梭并将卢梭视为精神导师的心路历程。杨振博士的《制造愤世嫉俗者——郁达夫与〈卢骚传〉》选择1928年郁达夫发表在《北新》杂志上的《卢骚传》为研究个案,通过郁达夫、梁实秋、魏肇基塑造的卢梭形象的对比,结合传论参看的各种论著,辅之以创作语境的分析进行阐述。著者认为,郁达夫不仅回避了卢梭性格中求人世而不得的缺陷,而且隐藏了其遗世独立行为背后的动机。他笔下那位不为名利所动的卢梭,仅仅是虚构和想象的结果。而这一虚构与郁达夫自我愤世嫉俗的行为特征是暗合的。卢梭之于郁达夫,不仅是一种文学想象,更是自我人格追求的一种精神

补偿。

上述卢梭研究系列,多数选自2012年6月南大卢梭国际研讨会中外学者的部分成果,也有一些选自法国、德国、日本等相关学术论坛和学人的相关成果,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丰富了当下的卢梭研究,为学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作为世界精神遗产的卢梭,是说不完的,道不尽的。我们不遗余力地多方采集这些研究成果,荟萃于此,以飨《跨文化对话》读者,旨在期盼着会有更丰硕的研究新成果问世。本专栏得以顺利开设,多承法方合作者唐吉教授、王晓苓教授鼎力相助,多承本栏作者和译者的积极参与,在此深表谢忱!南大卢梭国际研讨会中方主持人许钧教授、刘成富教授和他们的助手黄小彦博士,以及法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易杰先生和张艳小姐,对卢梭专栏的开设也十分支持和关注,我们在这里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2013年4月3日草拟,2013年4月18日修订,南京秦淮河西

